

· 专题研究 ·

秦代地方行政文书运作形态之考察

——以里耶秦简为中心

赵 炳 清

[关键词] 里耶秦简;行政文书;运作形态

[摘 要] 里耶秦简中大部分是秦代地方的行政文书,为我们考察文书的运作形态提供了根据。从已经公布的简牍来看,秦代文书的运作形态十分规范。撰写公文由专门的书佐承担,并且要在背面左下角以“某手”的形式签署,此人即为始发公文的责任者。在中间每一步处理环节书写完毕都要紧接着处理意见,签写其责任者的名,同样是以“某手”的形式。公文在抄写副本时也要将这些署名照录。收到文书后由责任者发阅,根据公文内容判断是否需要回复或转发。如果不需要,就直接在原简背面最左边写下收文记录并署名“某手”。如果需要回复或转发,就要另制作一份抄件副本,将来文内容抄于其上,并且将原文件的责任人署名照录于副本的同一位置,然后在背面左起第一行写下记录,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再将来文的原件交给上级处理。在文书运作中,文书的性质也随着“传”“别书”而发生变化。对于“某手”的理解,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书写者的签名,而应是文书的责任人。

秦代郡县制在全国确立,行政文书(也可称公文)成为各级政府机构之间沟通信息的主要载体,由于文献记载的缺失,我们对于秦代行政文书的传递、运作状况并不了解,多以汉简去推演。但近些年来不断出现的秦简,特别是2002年出土的里耶秦简,其中包含了大量行政文书,这就为我们解决上述问题创造了条件。最初里耶秦简公布的简文只有三十余简^①,学术界结合这批简牍对秦代文书的格式、文书的传递以及文书制度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意见^②。但是,对于文书在行政过程中的具体运作方面的研究尚十分薄弱。由于它是秦迁陵县处理行政事务的直接结果,所以这批文书就告诉了我们:它们的产生、收发文的记录情况,文书回复的制作情况,不同行政部门对文书的处理及应遵行的规范,处理后的文本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揭示秦代地方行政运作机制,了解秦代的地方管理无疑提供了契机。目前,里耶秦简第一册已经整理出版^③,公布了第5层、第6层、第8层的材料和图版,而陈伟先生主编的《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④又对此作了很好的释读,有利于研究的进一步进行。因此,本文拟全面系统地考察秦代地方行政文书的运作形态,对

① 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年第1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1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发掘报告》,岳麓书社2007年版。

② 关于运用里耶秦简研究秦汉文书制度的文章,主要有李学勤的《初读里耶秦简》(《文物》2003年第1期),胡平生的《读里耶秦简札记》(“简帛研究”网2003年10月23日),又见其《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第十节“湘西里耶秦简”,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王春芳、吴红松的《从里耶简看秦代文书和文书工作》(《大学图书馆学报》2005年第2期),高荣的《秦代的公文记录》(《鲁东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陈治国的《从里耶秦简看秦的公文制度》(《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1期),卜宪群、易桂花、刘俊男的《从出土简牍看秦汉时的行书制度》(《中国历史文物》2009年第4期),吕静的《秦代行政文书管理形态之考察》(“简帛网”2010年2月22日)等。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编的《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还收有汪桂海的《从湘西里耶秦简看秦官文书制度》,陈伟的《秦与汉初的文书传递系统》和日本学者藤田胜久的《里耶秦简与秦帝国的情报传达》。学者们对于秦代文书研究多是着重于文书的格式、文书的传递与文书的管理方面,而对于文书在行政过程中的运作状况,除了卜宪群、汪桂海、高荣先生的一些研究外,尚有空白之处。

③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秦简(壹)》,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

④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秦代基层政权的权力运作做初步的分析。不妥之处,敬请指正。

一 文书的封检

秦代文书的封检,由于此前缺乏文献的记载和材料的实证,我们并不清楚,仅靠汉代的一些封检去推测。而里耶秦简中有一些封检和封泥匣,为我们揭示了秦代文书封检的形态。

J1[6]2:迁陵以邮行

洞庭^①

此简是一枚“封检”,即文书传递时覆于文书之上起保密作用的封面,通常书写有文书的起讫地点及传递方式。其功能类似于现在的信封。有时在文书的下面还覆有一枚简,称之为“函”。实际上,在纸质书信出现以前,我们就可以视其为简牍的信封。

日安的《里耶识小》指出:“此简分两行书写,以邮行下有大段空白,所以‘迁陵以邮行’与后面的‘洞庭’能否连读当是疑问。”^②文章认为迁陵应是目的地,而洞庭是始发地,并列举汉简材料加以引证。如《居延新简》E. P. T53:86“居延甲渠侯官以邮行”。《居延汉简释文合校》74.4“张掖都尉章。肩水侯以邮行。九月庚午府卒孙意以来”。这些材料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以邮行”之前书写一个地名,在其左边另起一行书写另一个地名。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另一批里耶出土的封泥匣上:

J1-169:軹以邮行

J1[7]1:迁陵以邮行

J1[7]4:迁陵以邮行

J1[7]5:洞庭泰守府尉

河内

洞庭

洞庭

曹发,以邮行

这其中 J1[7]5 有些特殊,在“以邮行”前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地名,而是注明了开阅文书的机构,即“洞庭泰守府尉曹”,这显然是文书的目的地。可见另外几枚中在“以邮行”前书写的均应是目的地,而且仔细观察还会发现 J1[7]1 的“洞庭”并不是顶格写,而是还留有空白,再联系到“以邮行”下面的空白,基本可以认为“以邮行”与“洞庭”不能连读,并且“洞庭”二字颇有些落款署名的意味^③。因此,日安的推论比较准确。但是里耶出土的这批封检和居延汉简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居延简上有某某印或某某章的字样,而里耶简上只有一个地名作为始发地点标识,并没有印章的记载。可能因为此简是原件,而能表明何种印章的封泥已经在折封时与其分离,所以我们没有见到。

在新公布的材料中,有发书以印的记载:

5-22:狱东曹书一封,丞印,诣无阳^④。

8-375:司空曹书一封,丞印,诣零阳^⑤。

8-453:尉曹书三封,令印 其一诣销 一丹阳 一□陵^⑥

8-475:书一封,迁陵丞印,诣启陵乡^⑦。

又据岳麓秦简 1162 号简记载:“令曰:书当以邮行,为检,令高可以旁见印章,坚约之,书检上应署,令□负以疾走。不从令,赀一甲。”^⑧可见,秦代“以邮行”的文书,也必须在封检上署有印章,以和封泥上印章相互对照,增加文书往来的严密性。这种制度为汉所继承。

湖北荆州高台 18 号墓出土了一组木牍^⑨,M18:35 甲至丁,共四方,由上而下叠放在一起。

M18:35-甲:

安都

江陵丞印

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湖南龙山里耶战国—秦代古城一号井发掘简报》,《文物》2003 年第 1 期。后文简牍讨论中带有 J1 的简文皆出于此,不再出注。

② 日安:《里耶识小》,“简帛研究”网 2003 年 11 月 2 日。

③ 但发掘者和报告的整理者却将其连读为“迁陵以邮行洞庭”,认为是书写的始发地点和发往地点,显然是以为由迁陵发往洞庭的。如此,则与我们的意见正好相反。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湘西里耶秦代简牍选释》,《中国历史文物》2003 年第 1 期;又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发掘报告》,第 180 页。范毓周也持此种看法,见其《关于湖南龙山里耶出土秦代简牍邮书检的几个问题》(载“简帛研究”网 2002 年 8 月 15 日)。

④⑤⑥⑦ 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 1 卷,第 13、140、152、162 页。

⑧ 陈松长:《岳麓书院藏秦简中的行书律令初探》,《中国史研究》2009 年第 3 期。

⑨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22~223 页。

M18:35-乙:

正面:七年十月丙子朔庚子,中乡起敢言之:新安大女燕自言,与大奴甲、乙、大婢妨徙安都,谒告安都受[名]数,书到为报,敢言之。

十月庚子,江陵龙氏丞敬移安都丞。 亭手

背面:产手

M18:35-丙:

新安户人大女燕,关内侯寡。

大奴甲,大奴乙,大婢妨。 家优,不筭(算)不顾。

李学勤先生说 M18:35 甲就是和里耶 J1[6]2 一样的封检,并说这是文书的副本。正因为是副本,所以原应钤在封泥上的“江陵丞印”字样被直接抄定在了封检上^①。这样理解看似合理,但有一点是应该注意到的,这份文书里由江陵方面出具的由燕随身携带准备交给迁徙的目的地安都的凭证。若分正、副文本,那么这理应是一件正本,而副本应该在江陵留作存档,里耶秦简中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由此可见,秦代文书的封检制度是非常严密的,虽然在实物上我们还没有见到署有印章的封检,但从制度的规定性和简文的记载来看,这项政策应该是得到执行的。

二 文书的收发转批记录与特点

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行书律》中有对文书收发记录的规定,其文曰:“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暮,以辄相报也。”^②然而此前我们并没有见到过秦代的档案文书,而如今里耶秦简中大量的档案文书将有助于我们了解其收发记录的内容和特点,并加深对此条律文的理解。

J1[8]154 正面:卅三年二月壬寅朔(朔)日,迁陵守丞都敢言之:令曰:恒以朔日上所买徒隶数,问之毋当令者。敢言之。

背面:二月壬寅水十一刻(刻)下二,邮人得行。 圉手

本简是迁陵上书洞庭郡的文书,根据洞庭郡的命令,要求各县每月初一上报所买奴隶的数目。岳麓秦简 1173 中有“恒署书皆以邮行”^③的规定。这里迁陵县所上文书应该就是属于这种“恒署书”,因此迁陵的守丞照章办事不敢怠慢,于当月初一准时上报,由“水十一刻(刻)下二”可知,这件文书一大早就被邮人送出。这是秦代地方政府在日常政务中再普通不过的公文往来了,可它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当时公文运作的信息。通过图版我们可以发现文书正背面的笔迹明显不同,背面的文字全都书写在最左边一行,并且“二月壬寅水十一刻(刻)下二,邮人得行”与下面的“圉手”间有明显的差异,而“圉手”与正面的文字却很相似。这些迹象告诉我们,正面和背面是由不同的书写者完成的。正面的正文部分是由“圉”先完成的,然后在文书送出时由另一人在背面记录下发送时间及送信人等信息。这本该送往洞庭的文书为什么出现在了迁陵,最恰当的解释就是文书在制作时同时书写了两份,一份发出,一份存档,现在所见到的是留在迁陵作为存档的抄件。发文时在留作存档的这份上记录下了“二月壬寅水十一刻(刻)下二,邮人得行”的信息,而送走的那一份是否也有这样的记载呢?

J1[9]984 正面:廿八年八月戊辰朔丁丑,酉阳守丞□敢告迁陵丞主:亭里士五顺小妾□余有律,事□□□□迁口令史可听书从事,□□□。八月甲午迁陵拔谓都

背面:乡啬夫:以律令从事。朝手。即走印行都乡。八月壬辰水下八刻,隶妾以来。□手 □手

这是酉阳发到迁陵来的一件收文批转的文书,事关亭里士伍顺的小妾。大概此事属于迁陵的都乡管辖,所以迁陵拔在收到此文书后又转给了都乡。虽然由于简文模糊,我们对事情的具体内容难以全面

① 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文物》2003 年第 1 期。

②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0 年版,释文,第 61 页。

③ 陈松长:《岳麓书院所藏秦简综述》,《文物》2009 年第 3 期。

掌握,但這些事的處理過程還是清晰可見的。文書是八月十日在酉陽成文的^①,八月二十三日到達遷陵,八月二十七日再由遷陵拔批轉給了都鄉嗇夫。在這份文書上出現了“即走印行都鄉”及“八月壬辰水下八刻,隸妾以來”兩處發收記錄,都是出現在遷陵的,但不見從酉陽發出時的記錄。“即走印行都鄉”是與J1[8]154簡中“郵人得行”同一性質的發送記錄。因此,與J1[8]154互相參照,基本可以看出在發文的時候只是在存檔的抄件上書寫發送記錄,作為本方的備案,發送給對方的文書上則沒有這種記錄。而“八月壬辰水下八刻,隸妾以來”這樣的收文記錄,就應該是遷陵縣廷在收到酉陽發來文書後的記載了。

在里耶秦簡中,“某某以某行”之類是發文記錄,如“郵人得行”“守府快行”“隸臣某行”“疾走印行”等。而收文記錄一般是“某某以來”,如“守府快以來”“佐某以來”“隸妾某以來”等。

這樣,我們就知道了秦代地方公文運作的一些特點:所有文書都要有一份抄件作為存檔,發文時要在抄件上書寫發送記錄,收文時要在發來文書上書寫收文記錄。當文書需要轉發時則需再抄一份,將轉發的時間也記錄備案。

同時,我們還可以據此來討論秦代行政文書的書寫規範。從上舉兩例文書來看,首先,準確的時間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在文書製作時,要寫明年、月、日及月份的朔日,而在文書的發收時,更要記明日期時刻。其次,是對文書發送或收到時的狀況做記錄。即在發送時,是以什麼方式傳送的^②,是“郵人得行”還是“隸臣某行”等;而在收件時,是郵人送來的還是某人送來的。再次,是對文書的製作者和文書收發時的記錄者都要記錄。一般情況下,文書最後一個的“某手”是文書正文的製作者^③;在某一條記錄後的“某手”,一般是這條記錄的書寫者。當然,有時候某條記錄的書寫者也會沒有寫上自己的名字。如J1[8]154“二月壬寅水十一刻(刻)下二,郵人得行”的記錄者就是如此。最後,是文書中針對不同的對象有一些固定的書寫結構。發上級的文書,在開頭和結尾都用“敢言之”的固定結構,即使是文書內容很少,如J1[16]6背面“三月戊午,遷陵丞歐敢言之:寫上。敢言之”這樣只有“寫上”的內容,也要使用這種格式。對於同級機構的發文或回文,則使用“敢告”這樣的固定結構。無論是如J1[8]158和J1[9]984這樣的遷陵守丞與酉陽守丞之間的文書往來,還是如J1[16]6背面“三月庚戌,遷陵守丞敦狐敢告尉”這樣的遷陵縣廷內守丞與縣尉之間的文書往來,都用“敢告”的恆語。但對於下級機構的發文或回文,卻沒有固定的結構,用語很隨便,不像前面兩級機構這樣嚴格,如“謂”“告”“下”等。因此,通過文書中的用語結構,我們就可知文書的收發對象。

三 文書回復的製作

由上可見,對於發出文書的製作,我們一般是比较清楚的,即明確文書製作時間、發送對象、發送內容。同時,在製作正本時錄制一份副本,記錄下正本的發送時間和方式及文書的製作者。這在里耶公文里一般是一事一簡,簡的正面書寫正文,背面一般書寫發送的時間和方式及文書的製作者。對於收到的文書,一般在收文簡的背面記錄收到的時間和方式以及撤閱人和記錄者。至於收到的文書需

① 這裡只能說是成文時間,因為這個時間只是官員書寫這件文書的時間,而不是發出時間,具體發出的時間我們在這份收到的文書上沒有看到,因為它寫在了當地存檔的那份文書上面,而有的時候文書並不是在官員書寫當天即被發出,如J1[8]157的“正月戊寅朔丁酉遷陵丞昌都之啟陵……正月戊戌日中守府快行”,這件文書是在第二天才發出去的。因此,為了表述上的嚴謹,對於文書形成的時間我們只能稱為成文時間。

② 對於秦代的文書傳遞方式,李學勤先生認為主要有兩種,一是“以郵行”,有專門的郵人傳送,屬於緊急文書;一是“以次行”,即在各縣依次傳遞,屬於平常文書。見陳治國:《初讀里耶秦簡》,《文物》2003年第1期。有學者認為還有“輕足行”,指距離較近步行傳遞文書,見陳治國:《從里耶秦簡看秦的公文制度》,《中國歷史文物》2007年第1期;也見易桂花、劉俊男:《從出土簡牘看秦漢時的行書制度》,《中國歷史文物》2009年第4期。其實,高敏先生對秦漢文書的傳遞有深入的研究,見其《秦漢郵傳制度考略》,《歷史研究》1985年第3期。

③ 參見高榮:《秦代的公文記錄》,《魯東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邢義田:《湖南龍山里耶J1(8)157和J1(9)1-12號秦簡的文書構成、筆迹和原檔存放形式》,《簡帛》第1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但胡平生先生通過對J1[8]157閱讀順序的清理,認為簡文最後的“壬手”是簡文中最後一條記錄的經手者(見其《讀里耶秦簡札記》,“簡帛研究”網2003年10月23日,又見其《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第十節“湘西里耶秦簡”)。其實,此簡的運作流程十分複雜,我們後文要討論。但通過里耶秦簡的逐簡研究,我們還是傾向於在一般情況下,簡文最後的“某手”應是文書正文的製作者。

要回复,则是要另用新简。我们来看一下。

J1[9]981 正面:卅年九月丙辰朔己巳,田官守敬敢言之:廷曰:“令居贤目取船,弗予,谩曰亡。(亡)不定言论,及冀问不亡,定谩者訾,遣诣廷。”问之船亡,审沔泉乃甲寅夜水多,沔流包(浮)船,(船)繫绝,亡。求未得。此以未定。史逐将作者汜中。具志已前上,遣佐王操副诣廷。敢言之。”

背面:九月庚午旦,佐壬以来。/扁发 壬手

通过这件公文我们可推知,迁陵县廷此前应该是向田官发过一件内容为派人取船的公文,可田官守敬并没有用原件文书回复,而是又重新做了一件,在文中他先是引述了县廷来文的相关内容,然后再陈述自己对此事的处理情况。

相似的情况还出现在 J1[8]152 中:

正面:卅二年四月丙午朔甲寅,少内守是敢言之:廷下御史书,举事可为恒程者,洞庭上帮(裙)直,书到言。今书已到。敢言之。”

背面:四月甲寅日中,佐处以来/欣发 处手

这是一件回复给迁陵县廷的公文,有幸的是我们还见到了它所发出公文在县廷的存档,J1[8]156:“四月丙午朔癸丑,迁陵守丞色下少内,谨案致之:书到言,署金布发。它如律令。/欣手/四月癸丑水十一二刻(刻)下五,守府快行少内。”这两枚简的内容构成了一次完整的公文往来。先是迁陵丞四月八日向少内发文,要求“书到言”,也就是收到文书后回复,然后少内守在第二天就收到了这件文书,随即向县廷回复,告知收到了文书。从 J1[8]156 可知,在少内必然有一件从县廷发来与其内容相同的公文,可是少内守并没有接在原公文后面做回复,而是单独使用一枚简。虽然没有使用原来的公文,但少内守在回复的文中引述了原公文的主要内容,然后做了答复,“今书已到”。

从上两简来看,文书的回复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对文书所问的事情进行回答,如 J1[9]981;二是告诉发文方已经收到了文书,如 J1[8]152。因此,在文书回复制作时,必须要另用新简,不能在原文书上作答,因为原文书要作存档之用。同时,还必须将原文书的主要内容引述出来,以便让对方知道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不然,在案牘繁杂的情形下,对方会不知所云。

一般情况下,要求做出回答的文书都是比较重要的。如果发文机构没有收到文书的回复,不管时间多久,还可以继续发文追问,直到收到答复为止。如:

J1[9]1 正面:卅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司空腾敢言之:阳陵宜居士五(伍)毋死有赀余钱八千六十四。毋死戍洞庭郡,不智(知)何县署。今为钱校券一,上谒言洞庭尉,令毋死署所县责以受(授)阳陵司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年为报。已訾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戍所,报署主责发。敢言之。

四月己酉阳陵守丞尉敢言之:写上,谒报,(报)署金布发。敢言之。僇手

背面:卅四年六月甲午朔戊午,阳陵守庆敢言之:未报,谒追。敢言之。堪手。

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假尉觶谓迁陵丞:阳陵卒署迁陵,其以律令从事,报之,当腾(腾)。嘉手。

以洞庭司马印行事。 敬手

这是一件阳陵县司空腾写给阳陵县守丞尉的文书,要求洞庭郡尉追查毋死在洞庭郡何县服役,以便将其资产偿还其在阳陵欠下的债务。阳陵守丞尉同意了腾的请求,并将这件文书转发到了洞庭郡尉处,要求进行回复。过了一年多,阳陵县代理县令庆见还没有回复,再次发文进行追问。又过了十个月,洞庭郡代理郡尉觶发文迁陵县丞,要求对毋死以律令从事,对阳陵发文进行回复。在睡虎地秦简《行书律》中有“书廷辟有日报,宜到不来者,追之”^①的规定。可见,秦代对回复文书的重视程度。

①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第 61 页。

四 文书运作中性质的转变

关于里耶秦简行政文书的性质,学术界多有讨论^①。其实,从文书的收发记录来考察,我们认为只有发文记录的,一般是副本,没有进入文书传递过程;只有收文记录的,一般是正本,进入了文书传递过程。而既有收文记录,又有发文记录的,则文书性质比较复杂,应从文书运作中的历程来具体分析,并不能简单的以正本、副本或抄件来确定。因为经过不同的对象处理后,文书的性质会发生变化。下面我们就以 J1[16]6 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J1[16]6 正面:□田年二月丙子朔庚寅,洞庭守礼谓县嗇夫卒史嘉、段(假)卒史谷、属尉:令曰:“传送委输,必先悉行城旦春、隶臣妾、居赀、赎责(债),急事不可留,乃兴繇(徭)”。今洞庭兵输内史及巴、南郡、苍梧,输甲兵当传者多节传之,必先悉行乘城卒、隶臣妾、城旦春、鬼薪、白粲、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田时殴(也)不欲兴黔首。嘉、谷、尉各谨案所部县卒、徒隶、居赀、赎责(债)、司寇、隐官、践更县者簿,有可令传甲兵,县弗令传之而兴黔首,(兴黔首)可省少弗省少而多兴者,辄劾移县,(县)亟以律令具论,当坐者言名史泰守府。嘉、谷、尉在所县上书。嘉、谷、尉令人日夜端行,它如律令。

背面:三月庚戌,迁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乡司空、仓主,听书从事。尉别书都乡司空,(司空)传仓;都乡别启陵、貳春,皆勿留。它如律令。 / 扣手 庚戌水下□刻,走裙行尉。

三月戊午,迁陵丞欧敢言之:写上。敢言之。扣手 己未旦令史犯行。□田戊申夕,士五(伍)巫下里闻令以来。 / 庆手 如手

这件文书由洞庭郡于二月庚寅发往迁陵县,在三月戊申到达迁陵县。次日庚戌由迁陵守丞敦狐做出了明确的批示,对于文书在本县的运作流程进行了一系列的安排。完成文书的命令事项后,于三月戊午由迁陵丞欧回复,次日己未发出。由于此件“兴徭”文书是紧急文书,传递时要求“日夜端行”,完成后,可慢行,故于次日送呈。从迁陵守丞敦狐的安排来看,这件文书的内容先告知尉,然后由尉告知乡的司空和仓主。具体做法为:将此文书发送给尉,尉再发送给都乡司空,都乡司空传递给仓。然后由都乡发送给启陵、貳春两乡各一份。迁陵守丞在这一系列的处理过程中,使用的两个词语是需要我们格外注意的,它们是“别书”和“传”。辨明这两个词的含义有助于我们了解文书在不同部门的处理方式以及传送轨迹,而确定文书的传送轨迹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文书的属性。

这两个词虽然关键,但其含义并不难理解。别,分别。《礼记·乐记》:“好恶著,则贤不肖别矣。”^②《荀子·君道》:“知国之安危、臧否,若别白黑。”^③引申为分出,如《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④据此,“别书”应该理解为别外抄写一份文书发送。传,移。《礼记·内则》:“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传。”郑玄注:“传,移也。”^⑤这样我们可以把“传”理解为把文书本身发送出去。

基于这样的理解,我们再重新梳理一下这件文书在迁陵县的运作过程。

“迁陵守丞敦狐敢告尉:告乡司空、仓主,听书从事。”此句首先表明文书要下达的机关,包括县尉及各乡的司空和仓主。然后规定了具体的传递方式。“尉别书都乡司空”就是说县尉负责向都乡司空传递文书,通过“别书”可知,这次发传需要另抄送一份,原件是要留存县尉处的。接下来是“(司空)传

① 在里耶秦简公布之初,李学勤先生认为其“是秦迁陵县的官署档案,其中政府之间往来文书的原件及其副本占了相当比例”(见氏著:《初读里耶秦简》,《文物》2003年第1期);胡平生先生认为是“县廷的文书及副本”(见氏著:《长江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第306页);邢义田先生认为这批文书中,有“正本、副本和底本”的差别(见其《湖南龙山里耶 J1(8)157 和 J1(9)1-12 号秦牍的文书构成、笔迹和原档存放形式》,《简帛》第1辑);报告的整理者也认为是“正本与副本”(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发掘报告》,第215页)。以上为学界的主流看法,意见大体一致。但刘瑞先生从一件木牍的数件文书是同类相关事件的组合来看,认为是“整理抄写完成的公文书的辑汇本”,即专门对相关公文进行整理的人员将相关公文抄写在一牍上的汇集(见其《里耶古井 J1 和秦代木牍零拾》,《中国文物报》,2003年5月30日,第5版)。日本藤田胜久先生也主张这些文书“不是供传递的下行或上行文书的实物”(见其《里耶秦简与秦帝国的情报传达》,“里耶秦简国际讨论会”会议论文)。吕静先生则认为里耶秦简文书分为“一事一文一牍”、“一事多文一牍”两种类型,“一事一文一牍”形式的文书进入行政传递流程,而“一事多文一牍”的文书,是为了翻检查阅和存档备案之用所制作的档案文书(见其《秦代行政文书管理形态之考察》,“简帛网”2010年2月22日)。

②⑤ 《礼记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65、97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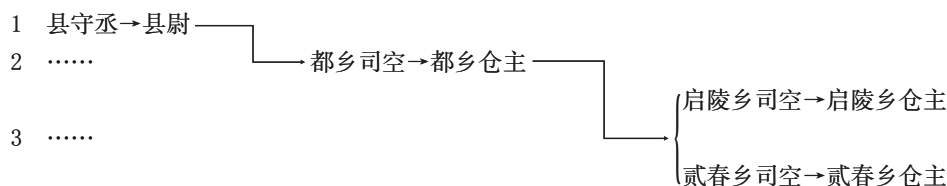
③ 王天海:《荀子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39页。

④ 《尚书正义》,阮元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4页。

仓”，这里用的是“传”，也就是都乡司空要将县尉发来的那份文书原件直接发送到仓。“都乡别启陵、贰春”，因为都乡是县廷驻地所在乡，所以文书先在都乡传阅，然后再发送到县的两个离邑乡启陵和贰春。这里又用到了“别”，那么县尉抄送的那一份就留到了仓，发往启陵和贰春的则是在仓又抄录的。由文书在都乡的传递顺序我们可以知道，文书在这两个乡也应依次传递给司空和仓主。这样，文书在迁陵县传递的全部过程就完成了。每一步都是按照迁陵守丞的指示在进行，并且文书的属性也在各个部门中发生着转变，有时是正本有时是副本。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发送公文都要留有一份存档备案，也就是说同一件文书最起码要保证发送部门和接收部门各持一份，这就出现了正本与副本的区别。这批出土的文书大多为副本，但也有正本，这需要我们仔细鉴别。正如邢义田先生所言：自发或收文者角度视之，所谓正副又可有所不同。自发文者角度看，发出者可有正有副，但收文者未尝不可将收到的公文书一律视为正本，如果依所书，再复写抄送到相关单位，正本又可以变为副本^①。

守丞敦狐将洞庭郡发来的文书传送给县尉，抄录一份做副本，后来又将上呈洞庭郡的文书抄录在此副本内，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J1[16]6 文书。县尉将守丞发来的文书另抄一份发送给都乡司空，那么在县尉处，文书的正本就自然作为存档，而司空则是将县尉发来的那份副本又传递给了仓主。当然，仓主也应将收到的文书视为正本，像尉一样将这件正本作为存档，然后又别书二封副本分别发送给了启陵、贰春两乡。二乡的司空、仓主则将传来的副本视为正本保存。

为了总结规律，我们可以把文书的运作过程转换成以下流程图：



在图中，平直的箭头表示直接传递，曲折的箭头表示别书抄送。每一层代表使用同一件文书传递，其中第 3 层是两件文书分别在两个乡平行传递。

通过上图我们发现，平直箭头连接的两个部门正好是平级的关系，例如同属于县府机关的守丞和县尉；同属于乡府机关的司空和仓主。而曲折箭头连接的要么是上下级关系，如县尉和都乡司空，要么是平级但不是一个系统，如都乡仓主和启陵乡司空。

经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秦代公文在传阅时有两种运作方式，即为直接传递和别书抄送。一般情况下，在平级机构中相互传递的文书，即用文书正本直接传递，文书正本在最后的平级机构留作存档，其他平级机构以抄录的副本作留存。据学者研究，秦代公文传递一种是“以邮行”，由邮人专门传递，属紧急公文；一种是“以次行”，即在各县之间依次传递，由近至远，传至最远的县^②。这种“以次行”的形式，传递的应该是文书的正本，而各县留存的应是抄录的副本。别书抄送一般是在需要留存文件正本时，抄送的是文件副本。这种情况多是发生在紧急文件需要同时传送多个地方的运作上。如果按“以次行”来传阅文件正本，则误事。所以，就需要抄送多件副本分别传送。从本档文件来看，应是县尉同时别书都乡、启陵、贰春三乡。但由于都乡为县廷之所在，故县尉只别书了都乡，再由都乡别书启陵、贰春。在云梦睡虎地秦简《语书》中有“以次传。别书江陵布，以邮行”^③的记载，可以看出江陵在秦南郡中具有重要地位，需要单独抄录一份副本，由邮人传递，而文件正本则在各县之间依次传递。由此可见，文书在运作过程中，其性质是多变的。一般情况下，“传”多是文书正本，“别书”则为文书副本。

① 邢义田先生所言见前揭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里耶发掘报告》，第 215 页。

② 参见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文物》2003 年第 1 期；陈伟：《秦与汉初的文书传递系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里耶古城：秦简与秦文化研究》，第 150～157 页。

③ 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睡虎地秦墓竹简》，释文，第 13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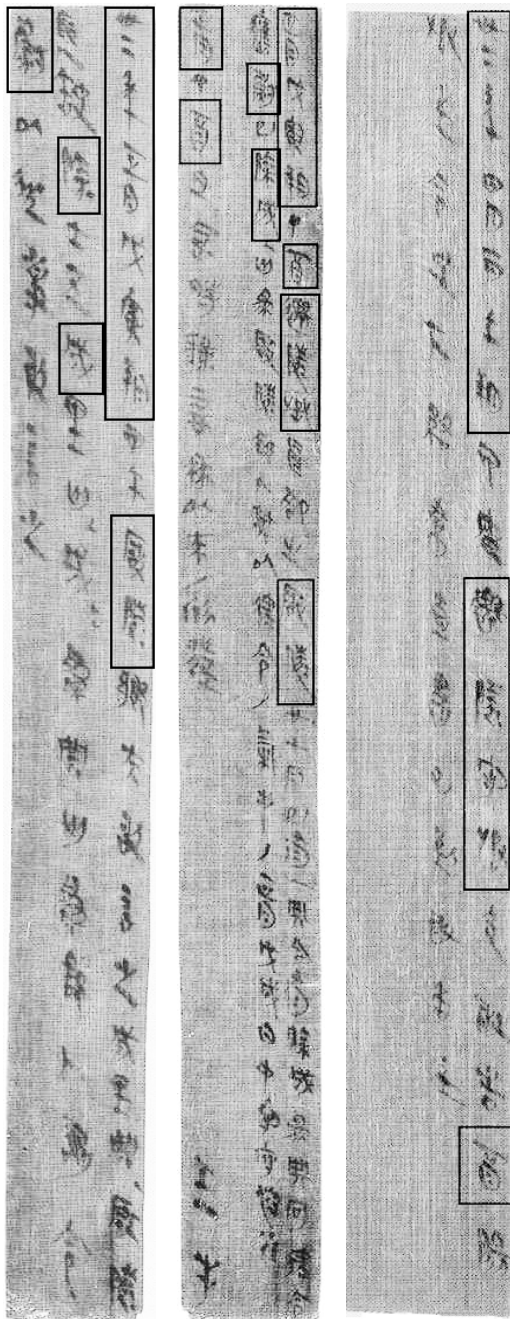
五 文书中的“某手”与运作规范

行文至此,我们已经对公文的收发、回复及书写规范有了一定认识,可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有涉及,那就是处理这些公文的人员。在简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名,有的是配以职官名称,有的是以“某手”“某发”形式出现。正是这些基层的官吏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日常往来的大量公文,共同支撑起了秦代地方行政运作体系。了解这些人处理公文的程序,如何划分职责,可以使我们看到当时公文运作流程的真实面貌。下面我们结合几枚简来考察一下。

这批里耶的公文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每件文书的一段末尾会有一个人的签署,即“某手”。李学勤先生认为:“文书中签写‘某手’的人是具体负责写抄、收发文书等事的吏员。”^①也就是说官员不直接撰写公文,具体撰写公文的是那些签以“某手”的书佐。因此,我们就把目光重点放到这些签写“某手”的公文执笔者上来。

通过《简报》发表的图版,我们发现很多公文的背面左下角都有一个“某手”的署名。邢义田先生曾撰文论证这个人就是正面文书的书写者^②。我们同意这种观点,但是里耶简所反映出的当时的公文运作流程非常复杂,有原件和抄件,正本和副本等区别,因此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些简并不能一概地说都是由简背左下角署名者所写的。

我们来看 J1[8]157。这枚简背面有一“壬手”字样,按邢先生所说,壬就是书写正面内容的抄手,并且“壬手”二字的笔迹无论是从运笔用墨还是从字形上看都非常相似,相信每位看过图版的人都会同意这是出于同一人的手笔。但这真的是“壬”书写的吗? J1[9]981 中也出现了“壬手”,但两简的笔迹我们一看便知绝非同一人所写。J1[9]981 是三十年九月所写, J1[8]157 是三十二年正月所写。两简前后相差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并且都属于迁陵县, J1[8]157 中的“壬”是启陵乡人, J1[9]981 中的“壬”也是某乡田官的佐,很可能就是启陵乡。在这样有限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出现重名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说这两个“壬”应该就是同一个人。同一人的书写笔迹不至于有这样大的差异,而且 J1[9]981 应该是一份公文的原件,因为它只是田官上书县廷汇报工作的公文,到了迁陵县廷后只是作了签收记录,没有回复或转发等后续处理环节。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将来文的原件直接作为存档,不需要抄写。而 J1[8]157 是一枚收文回复后留在迁陵的存档文件,其处理流程较之 J1[9]981 复杂,其间可能产生传抄。这样的话,我们更倾向于 J1[9]981 上的文



J1[8]157A

J1[8]157B

J1[8]158A

① 李学勤:《初读里耶秦简》,《文物》2003年第1期。

② 邢义田:《湖南龙山里耶 J1(8)157 和 J1(9)1-12 号秦牍的文书构成、笔迹和原档存放形式》,《简帛》第1辑。后文中邢先生所论,皆见于此,不再出注。

字是“壬”的真迹。那么 J1[8]157 是何人所抄写呢？通过细审图版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令人欣喜的现象：J1[8]158 正面的文字和 J1[8]157 是同一人所写。

我们先看 J1[8]157，其实这枚简的两面也是由同一人所写。通过对比写在两处不同的字词我们可以很直观地发现这一点，例如“正月戊寅朔”“启陵”“除”“成”“尉”等字，虽大小和用墨有些不同，这可能是因为不是同一次书写所至，但看他的字体均如出一辙，并且从全文来看，正面和背面的字迹都是呈左上到右下倾斜的一种形态。这样我们基本可以认定 J1[8]157 的两面均出自同一人之手。有了这一点认识后，我们再来观察 J1[8]158，其字形也是左上向右下倾斜，“卅二年四月”“朔”“迁陵”“守丞”等字和 J1[8]157 中对应的字也非常相似，并且两简都出现了“欣”这个人的签名。J1[8]158 的情况同 J1[9]981 有些类似，在简文中也是没有更多的处理程序，它只是一件始发公文的抄件，并且只有“欣手”一处署名，因此它应该就是“欣”亲手所写。这样，我们就可以间接的证实 J1[8]157 的书写者也是“欣”。由于“欣”供职于迁陵县廷，所以这枚简就应该是在县廷抄写的一件副本，“壬手”自然就是“欣”在抄写时照录下来的了，可见当时公文管理的严密，与本件公文有关的每位责任人都要记录备案。另一位参与者“气”的情况也如此，虽然有“气手”的签署字样，但这只是“欣”的抄录并非“气”的原迹，“气”也并不是这枚简的书写者。下面我们来梳理一下这枚简的全部处理流程。

启陵乡夫向迁陵县请示关于成和句两人的任命一事，请示的公文送达迁陵后由欣发阅。由于此事需要回复，那么县廷应该留一份存档，所以欣在看过后没有在原简上记载签收记录，而是另选一枚新简记下签收记录并将原简内容抄录于此，原文的书写者也在相同的位置一并记下。欣在制作副本后才将来文的原件交给上级处理，包括令、尉在内的决策层以及主管文书工作的丞在经过某种形式的商讨后形成处理意见，然后以丞昌的名义向启陵复文，由气执笔将处理意见书写成复文。至此，公文的回复文本已经成形。但这件公文并不能马上发出，因为此事是如何处理的在本部门也要备案。这样，回复公文又被交到了欣的手里，他将上级回复的内容也抄录在了先前制作好的副本上面，这时公文就可以发出了。最后一步就是将公文发出时间及送信人也记录在副本之上。这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这枚简的全部内容。

在此事中，欣负责收发与档案制作，气担任县丞的秘书承担公文的缮写，分工明确。但我们并不能说这些就是他们的固有职责，有时候他们的角色也是会转变的。例如，在同年四月的 J1[8]156 和 J1[8]158 中欣做的是与 J1[8]157 中气类似的守丞秘书的工作，而在 J1[8]152 中又成了收发人员。所以说他们的职责并没有明确的区分，都是供职于县廷的书佐，当处理一件公务时往往是临时承担某一个环节的工作，下一次可能又有不同。由此可见，当时的官署似乎没有设置像今天这样专职收发的部门，有关公文处理的各项具体工作都是由像欣、气这样的书佐群体来共同承担的。

在经过前面一系列的分析之后，我们来对秦代公文运作中的一些规范做以下归纳。

1. 撰写公文由专门的书佐承担，并且要在背面左下角以“某手”的形式签署，此人即为始发公文的责任者。在中间每一步处理环节书写完毕都要紧接着处理意见签写其责任者的名，同样是以“某手”形式。公文在抄写副本时也要将这些署名照录。

2. 收到文书后由责任者发阅，根据公文内容判断是否需要回复或转发。如果不需要，就直接在原简背面最左边写下收文记录，某时某刻由谁送来，紧着在下面署名“某手”或“某发”，然后交给上级或存档。如果需要回复或转发，就要另制作一份抄件，将来文内容抄于其上，并且将原文件的书佐署名照录于抄件的同一位置，然后在背面左起第一行写下记录，这些工作完成之后再将来文的原件交给上级处理或存档。

3. 发送公文要记录发送信息，收到公文要记录签收信息。这种记录只写在己方作为存档的文本上，不会出现在发出的公文上面。也就是说，只要看见公文上出现这种记录，我们就可以视其为存档文书，不再进入流通环节了。因为收发记录不属于公文正文的必备要素，它是为本部门档案管理工作服务的，所以没有必要记录在让对方看到的公文发送件上面。收发记录也可以作为判断公文属性的一个标志。

六 关于 J1[9]1-12 简文书运作的讨论

有了以上的研究基础,我们可以试对本次发表的比重最大,也是内容结构最复杂的第 9 层的那批 12 件讨债公文进行分析。这批简是专为追讨 12 个人的债务所发,每人一简,结构基本相同。现举一例如下。

J1[9]1 正面:卅三年四月辛丑朔丙午,司空腾敢言之:阳陵宜居士五(伍)毋死有赏余钱八千六十四。毋死戍洞庭郡,不智(知)何县署,今为钱校券一上谒,言洞庭尉令毋死署所县责以受(授)阳陵司空,(司空)不名计,问何县官,计年为报。已訾其家,(家)贫弗能入,乃移戍所,报署主责发,敢言之。

四月己酉阳陵守丞尉敢言之,写上谒报,(报)署金布发,敢言之。僇手

背面:卅四年六月甲午朔戊午,阳陵守庆敢言之,未报谒追,敢言之。堪手。

卅五年四月己未朔乙丑,洞庭假尉觿谓迁陵丞:阳陵卒署迁陵,其以律令从事,报之,当腾(腾)。嘉手。以洞庭司马印行事。 敬手

其运作流程涉及阳陵县、洞庭郡、迁陵县三地多个部门及多名行政人员。邢义田先生通过文书构成和笔迹等方面对这批公文作了详细的考察。他认为 J1[9]2、4、5、6、8、9、11 七简正面的笔迹相同,应为一人所写;僇手与堪手的笔迹相同,常一起出现;J1[9]1、10 两简笔迹相同,虽署僇手,但与上七简笔迹不同,应不是僇手所写。又认为现在见到的这批文书是迁陵县的抄件,其十二简三十三年、三十四年的主体部分由敬抄写,三十五年的那一部分是由嘉将三十四年存档的底本找出补抄而成。而王焕林先生则认为此十二件木牍全部出自同一人之手,即最后结尾处“统一出现在木牍左下角最底端的‘敬手’,必然就是迁陵县书佐的署名”^①。

对于邢先生的观点,我们赞同其笔迹比对部分的结论,而其后的推论,我们认为,他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阳陵县发出的公文必经洞庭郡的批示才会到达迁陵县。因为文中明确说,这批公文是上谒洞庭郡尉的,而且阳陵方面“不知何县署”。试想在这种情况下,公文如果没有洞庭郡在三十五年四月初七所做的批转处理,怎么会先行出现在迁陵县呢?所以公文都还没有送来,迁陵县的所谓三十四年制作的底本也就无从谈起了。另外,邢先生还认为这些公文不是原件而是迁陵县的抄件的理由,就是如果是原件将很难解释三十三年三、四月发生的事,为何到三十四年八月经一年多才处理。其实这是很好理解的,由于这些公文从阳陵发出后一直没有得到回复,所以在三十四年的时候才由阳陵县时任的主管人再次发文追问。

从 J1[9]1-12 的记录来看,阳陵县司空腾的报告主要分为两个时间段,一个是三十三年三月丁酉(二十七)和戊戌(二十八)这两天,发送了 2、3、9、11 四简;一个是三十三年四月丙午(初六)和戊申(初八)这两天,发送了 1、4、5、6、7、8、10、12 八简。而转发洞庭郡尉的阳陵守丞也是分两个时间段处理的,一是三十三年四月壬寅(初二)这天,由守丞恬转发 2、3、9、11 四简;一个时间段是三十三年四月戊申(初八)由守丞尉处理 8 号简,己酉(初九)由守丞尉处理 1、4、5、7、10、12 六简,庚戌(初十)由守丞买处理 6 号简。因此,这 12 件公文在阳陵并不是同一天发出,而是分两批或几批发出的。再从简文来看,阳陵县在三十四年六月戊午(二十五)追问 1 号简,六月壬戌(二十九)追问 10 号简,七月辛卯(二十八)追问 3、12 两简,八月癸巳(初一)追问 2、5、6、7、8、9、11 七简,八月甲午(初二)追问 4 号简。从追问的情况来看,可能是阳陵县清理存档时陆续发现洞庭郡没有回复而追问的。而洞庭郡则把这十二档公文全部在三十五年四月乙丑(初七)这一天做出处理,由洞庭郡假尉觿转批给迁陵县丞,叫其按律令行事,对阳陵的发文进行回复。经过这样的梳理,我们就应该将其理解为是在洞庭郡的一次集中清理未处理公文,而非在迁陵县的一次集中补抄了。

我们也对笔迹进行了比对,觉得邢先生所言的 J1[9]2、4、5、6、8、9、11 七简正面应为同一人所写,甚是。而 J1[9]1、10 两简正面为另一人所写,则是值得商榷的。从两件文书三十三年完成的文字来看,应是同一人所写,而三十四年完成的文字则为两人笔迹。对于邢先生没有言及的 J1[9]3、12 两

^① 王焕林:《里耶秦简文字书法论略》,《中国书法》2005 年第 9 期。

简,我们比对后,认为两简正面笔迹相同,为一人所写。如此,这十二简可以为四组,分别为不同的人所抄写。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三十三年阳陵县守丞发文到洞庭郡尉处,应是留有存档的副本的。四月二日由守丞处理的是 J1[9]2、3、9、11 四简,除 11 号简没署名外,其他三简都有“堪手”,应当是由堪抄写而存档的。四月八、九日是由守丞尉处理 J1[9]1、4、5、7、10、12 六简,十日由守丞买处理 6 号简,这七简都署名“儋手”,应由儋抄写存档。三十四年,阳陵县在整理存档时发现洞庭郡尉对这批文书没有回复,按律应当继续追问,因此,他们就按整理时发现的存档的早晚进行追问。因为时隔一年多了,怕洞庭郡尉不知为何事追问,故而应将存档文书抄录一份作为正文发出。但六月二十五日和二十九日的 J1[9]1、10 两简却将“儋”书写的存档文书作为正文,“堪”和“纠”分别完成了三十四年的文字;七月二十八日的 J1[9]3、12 两简为又一书手所为,签署的是“堪”;八月一日、二日的 J1[9]2、4、5、7、8、9、11 七简为第三书手所为,签署为“堪”。这些文书陆续发送到洞庭郡尉处后,在三十五年四月初七由嘉按照郡尉的意见作了记录,整批转发到迁陵县,迁陵县当作正文文本存档。如今我们所见到的这十二简应该是这样来的,它既不是邢先生所推断的那样,也不是刘瑞先生所说的是政府部门为了某种目的派出专门抄手(如:敬)特意抄成的辑汇本^①。

很显然,嘉应是洞庭郡的书佐。正如我们在前文分析的,公文抄写时要照录此前已有的签署,一个迁陵县书佐名签到了洞庭郡的处理意见后是不合规矩的,而且每一步处理环节都要伴随其执笔者签署,迁陵县书佐的签署是不应该替换掉原有签署的。

另外,敬也不是迁陵县人,而是属于阳陵县的。根据转发公文要用原件的原则,这批公文的主体部分(三十三年部分)应该是在阳陵形成的。阳陵守丞的上报和追问这两部分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执笔签署,那么阳陵司空在最初发出这件公文时也应留下相应的执笔签署,这正好就是背面左下角的“敬手”。可见敬是隶属于阳陵司空的一名办事人员,而不是迁陵县抄手。

从十简有“敬”的署名和十一简有“堪”的署名来看,显然和上述的图版笔迹不符。署名为“堪”的简却分明显现出三个人的字迹,署名为“敬”却显现出两人的笔迹,简 2 和简 10 的“敬”应为一人所书。因此,有学者认为“某手”并不是书写者的名字,可能是专职文书工作之类的书佐人员^②。确实,将“某手”完全理解为抄写者恐怕有失偏颇。正如邢先生所说:“从行政程序看,某人签署和某人抄写意义并不一样。签署意味署名负责文件的行政程序或文件的内容;抄手抄写则只是抄录誊写,除了抄誊上的错漏,并不一定意味着要负担程序和内容上的责任。”看来,“某手”不能完全理解为文书的书写者,可以理解为文书的经办者或责任者。一般情况下,责任者负责文书的书写,但有的时候,文书也可由其他人代写而署上责任者的名字。

七 结 语

通过前文的深入考察,我们可见,文书是秦代各层级政权行政的重要手段,既是传达军国政令、通报行政执行情况的工具,又是开展行政工作的依据,具有法律凭证的作用,反映了秦朝的行政运作机制和职能。

就里耶秦简来看,秦代县级基层政权公文的运转主要有四类:一是中央、郡下达到县的文书,其中主要的是与郡之间的公文往来,执行上级的行政命令。二是在所辖境内发布的公文,实施行政管理。三是向中央、郡汇报的行政报告,接受上级的审核和检查核对,如簿、籍和计。四是处理下属机构的上行文书,做出行政批示。显然,随着秦的统一,郡县制推行到全国各地,县成为秦朝的基层政权组织,在秦朝公文传播制度中处于最低层次,受到郡,甚至中央的制约。这种层级制的行政文书传播体系反映了秦朝官僚政治的科层制。

秦朝官僚政治的科层制主要是由秦朝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体所决定的。在地方实行郡、县两

^① 刘瑞:《里耶古井 J1 和秦代木牍零拾》,《中国文物报》,2003 年 5 月 30 日,第 5 版。

^② 林进忠:《里耶秦简“赏赐文书”的书手探析》,《湖南大学学报》2010 年第 4 期。

级政区,县受控于郡,而郡又受控于中央,中央则实行君主专制。这样,就形成中央、郡、县的三级行政管理体制。这种三层级的行政管理体制也就决定了行政文书传播的层级。为了实施有效的政治治理,文书成了最主要的手段和工具。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法律文书中,就有对文书传递作出严格规定的《行书律》。当然,从我们前述来看,也可见秦代文书运作的严密和规范。因此,繁重的公文往来、严格的公文程序构成了秦朝政治治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秦朝行政运作的主要形式。

在里耶秦简中,秦迁陵县公文的主要处理者为丞或守丞。在丞或守丞下面有一群辅佐的书吏,他们根据丞或守丞的处理意见来具体操作,或回复,或别书,或询问。同时,他们也负责公文的存档,有的以原件保存,有的则需要誊录副本保存。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公文的处理机构。这个机构无疑是迁陵县的权力中枢。其他如尉、各县曹以及乡成了执行机构。

一般情况下,秦县置有县令或县长,而丞、尉为县之长吏。但在里耶秦简中,却不见秦迁陵县令长,却多见迁陵县丞或守丞。这说明在秦迁陵县的主官实际上是县丞。究其原因,应是秦在迅猛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其官吏人才的储备没有跟上,导致一些“新地”吏员长期空缺。在岳麓秦简记载的律令中,就有将在秦原统治地区犯有过失的官吏任为“新地吏”的条文^①。这正是针对官吏缺乏而采取的变通作法。

如今,里耶秦简正在整理公布,有关秦代基层政权行政运作的材料会逐渐被揭示,其学术研究价值无可估量。

收稿日期 2013-09-11

作者赵炳清,历史学博士,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开封,475001。

Operational Pattern of Local Administrative Papers in the Qin Dynasty

Zhao Bingqing

Keywords: Liye bamboo slips of the Qin; administrative document; operational pattern

Abstract: Most documents in Liye bamboo slips of the Qin dynasty are local administrative papers, so they provide us a number of materials for studying operational pattern of papers. Operation of documents are rather standardized in the published Qin Liye bamboo documents. Official paper was written by a specific secretary, who signed his name on left bottom of the back of the paper, he was responsible for this paper. In subsequent operation each operator would add his opinion and name on the paper, copying the paper need recording the names in existence. Once received a paper, the responsible person would read it, then decided whether or not reply or transfer it. If it was no need to do so, he wrote his received record on far left of the back of the bamboo document and signed on it his name. If needed a reply, he would make another copy and transcript the content of the document and the existed names on the new bamboo slip in the same place, then gave a record on the left first line. After completion of this work, the document was passed to the superior to decide. Nature of a document changed in its operation. The names on it are not simple signatures, it refers to the person in charge.

【责任编辑 叶子玉】

^① 于振波:《秦律令中的“新黔首”与“新地吏”》,《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